

史料“三新”拓展深層

王 杰

孫中山研究，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被學界譽為“顯學”，弦外之音者，高處不勝寒也。如何拓展與深化，頗費思量。史料即史學，本文之“三新”，可釋為：新史料的發掘、偽史料的考訂、舊史料的新解。

一、新史料的發掘

孫中山史料，大致分為兩大板塊，一曰“主體”（孫中山本人），一曰“客體”（與孫中山相關者）。經過百餘年的發掘，以《辛亥革命》（資料叢刊本）、《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》、《孫中山全集》、《國父全集》、《革命文獻》、《孫中山年譜長編》等巨編為經典的“主體”史料，經已從數以百計向數以千計邁進。大體上說來，“主體”史料難再有“井噴”式的發現，而對四散的“碎金碎銀”，仍有收穫的空間。本人曾於 2000 年在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蒐集到不少孫中山批閱的函件，又在“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（1833～1911）”和“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（1911～1949）”蒐獲孫氏的“談話、函電、題詞”等二十餘篇。黃彥主編的《孫文全集》將以不少“新史料”予人驚喜，桑兵主編的《孫中山史事編年》亦將展示孫中山相關史料更宏大的畫面。凡此，對於串聯孫中山的思想與事功，無疑起到重要的“鏈條”作用，對推動孫中山研究的縱深發展，意義非凡。

與“主體”史料的深入發掘相較，“客體”史料的開發令人眼界大開。近年，桑兵主編的《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彙編》給人耳目一新之感。古應芬、陳策、劉紀文、伍漢持、田桐、曾省三等原始資料斷續在海外的發現，令人感奮有加。應該看到，孫中山早年生活環境的史料，仍屬薄弱環節，與孫中山相關人物史料的蒐集和整理大多仍顯蒼白，比如曾經追隨或與孫中山並肩戰鬥的陳少白、馮自由、胡漢民、陳其美、程璧光、陳友仁、伍朝樞等人的文集仍付之闕如，《馬坤回憶錄》未見中譯本，《伍廷芳集》問世於 1993 年，仍有較大的增補餘地（尤其是伍氏出任公使期間的外文材料）。再者，對立面、海外華僑華人的相關史料，恐亦挂一漏萬。筆者於 2014 年在溫哥華所見《加拿大洪門民治黨員名冊》（1898～1948）、《加拿大洪門捐款登記簿》（厚達一尺多，埃德蒙頓），孫中山關於“博愛”的題詞（溫哥華）等，這些零星珍品，或可對孫中山民主革命的“海外策源地”提供新的史料支撐。而此間洪門所藏《清室關於預備立憲告示》（1910 年毛筆抄件，溫哥華），即可從另一個側面驚見洪門組織與清室互動的奧秘，這究竟是“逢場作戲”的“表面文章”，抑是“八面玲瓏”之“江湖做作”？尚待深入研究。但華僑思想之繁亂、革命組織內部之駁雜、海外革命局勢之險惡，則有目共睹，這一點毋庸置疑。有鑑於此，本人欲與張金超編輯《孫中山史料拾遺》一輯，旨在突破舊觀念，不僅收錄孫氏佚文、各方致孫氏函電、孫氏活動

行蹤的報導，還將時人的回憶等也一併考慮，含晚清民國期刊數據庫、海外報刊如新加坡的《新國民日報》、《叻報》、《南洋商報》，加拿大《大漢公報》，新西蘭《民聲報》等相關資料。《新國民日報》係新加坡國民黨分部於1919年創辦，關注國內孫中山行蹤與言論，重墨國外國民黨分部活動的報導。將散見新素材冶成一爐，有利於與已有的史料相互補充、印證。

二、偽史料的考訂

學人在史料辨偽方面下過不少功夫，如《孫中山文史考補》^①、《孫中山家族源流考》^②等可視為有益嘗試，孔祥吉亦曾就《革命逸史》的史實謬誤做過考證，等等。^③毋庸諱言，迄今為止，相關的考訂充其量只是零敲碎打，未見一本有份量的史料辨偽專著，尤其缺乏羅爾綱式的“冷板凳”大家，這委實與孫學研究的顯學地位不相匹配。十多年前，有學者曾大聲疾呼要對《革命逸史》進行全面考證，並預計辨偽文章的份量不亞於《革命逸史》原版。僅以《革命逸史》第五集載《丁未潮州黃岡革命軍實錄》為例，洪洲之役時間有誤。其原文稱：“十四晚黨軍探報黃金福駐兵洪洲”^④，附錄《周馥之奏摺》亦稱“十四日夜匪撲洪洲……十五黎明，賊分五路，水陸並進……相持至十五日戌刻”^⑤。但參加黃岡起義的領袖余永興《丁未潮州黃岡舉義記》記載：“十三日晚，余既成帶隊攻洪洲，陳湧波攻潮州”，十四日黎明“方至洪洲，黨軍陣亡二十餘人。陳湧波轉援洪洲，清軍佔東灶後高山，血戰二小時，清軍增援數百人，午後一時黨軍退守下園鄉”。照此推測，進攻洪洲應為十三日晚，十四日黎明開始交火，一直持續至十五日傍晚，歷時兩日，間中有陳湧波率隊增援。^⑥

再如，中國革命博物館藏有一封1924年8月孫中山致廖仲愷的信，經考證確屬贗品。^⑦這樣的贗品如不剔除，將對孫中山此間的抉擇造成極其“混亂”的猜想，孫中山的形象也勢必大打折扣。又如孫元超編《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譜》^⑧收有孫中山致徐錫麟函一封，多位學者已考出該函係偽作，但該書第二次印刷時仍然照錄。類似情況，需及時糾正，避免以訛傳訛。

與史料辨偽相關，還必須對史學的“偽命題”進行嚴肅的“糾偏”，以正學術視聽。曾幾何時，“革命不如改良”、“告別革命”論甚囂塵上。這是歷史虛無主義的陳詞濫調，因為歷史上發生的事情——歷史已經是這樣，學人只能研究其為什麼會這樣，而不是一味指責歷史不應該這樣。此乃唯物主義之常識！此外，還有一種以情感代替理性的傾向，實不可取，比如說孫中山“不可能簽訂《中日盟約》”，認為果有其事，則有失其愛國形象。應該指出，孫中山在黨人生活無著、革命孤立無援、前途絕望的窘境下，以退為進，即使簽約亦屬策略之謀、權宜之計，無損於孫中山的偉大！再者，孫中山是人不是神，其時是在搞政治革命，不是在溫良恭儉讓中寫文章！

三、舊史料新解

史料新解，在很大程度上與實事求是同義，與歷史關注現實同義。猶如對孔子及儒學的闡發沒有窮期一樣，對孫中山功業、思想與遺產的研究，亟須求實與應時，方能發掘孫中山遺產為現實服務的切入點，使孫中山研究更富生命力，臻於永無止境。近年來，不少學人關注孫中山社會建設思想、文明理念培育、振興中華大業、孫中山與世界等專題，並漸次從崇拜與紀念、口述史、學術史方面著力，推進了研究的拓展。

要之，史料新解，要從大範圍、長時段中去把握，從書生、理想家、革命家、基督徒、醫生等視角去展示孫氏人生的多維度。揭示其以書生的理想去實踐中華振興的抱負，其多重“身份”

如何激勵他百折不回；他企圖以“實用主義”策略與官僚政客軍閥打交道，收穫的只能是屢起屢敗；但他又不能逃避詭譎的現實，以致在難以適應現實又要面對現實的困境中前行。

就“求實”而言，以晚年聯俄為例，切不可忽略孫氏的“務實”性格，更不能用“以俄為師”一句名言來取代其外交策略的多元選擇。他曾言之鑿鑿：“我黨今後之革命，非以俄為師，斷無成就。”^①這是在獲取蘇俄實質性的援助之後、在致蔣介石的私人信函中說的話。也是此間，他又派鄧家彥秘密聯絡德國，諭以“如德國政府能視中國為一線之生機，中國亦必視德國為獨一之導師”^②，這不能不說是多手準備。而他與日本的關係更為微妙，自1895年春求助日本駐港領事開始，至1924年11月在神戶作《大亞洲主義》講演止，凡三十年，他一直企盼日本援助中國革命。在與俄國人達成協定後，孫氏仍於1924年1月向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“發出最後一次呼籲，要求他促成大規模的國際干預，這種規模的干預甚至連俄國也從未試圖進行過。他建議英、法、美三國佔領中國五年，消滅軍閥，跟國民黨合作，建立一個公正的政府，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，使人民做好民主選舉的準備。”^③以至被蘇俄譏稱為“調情”。可見，聯俄乃孫中山多方試探後的唯一抉擇，係雙方利益均沾所致。實事求是，乃是避免矯枉過正。應該指出，孫中山的思想在當時還缺乏實踐的時間與空間，而思想付諸於實踐，肯定要作不斷調適，由是，研究其理論要與實際相切合，引用隻言片語，有時難免斷章取義。

以“應時”為例，孫中山與中華民族復興的世界意義，仍有待加強研究。政治上，民國肇建對亞洲共和意識的提振、對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喚醒、對華僑在世界範圍的互動、與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異同等，個案研究乏力。經濟上，民初實業勃興、實業計劃的描繪、借用外力振興中國，研究深度不足。文化上，提倡世界道德新潮流、譽毀王道與霸道、華夏文明要為世界文明作貢獻，大有闡釋空間。與之相關者，深入研究孫中山與眾多外國人的關係，可昇華其世界視野與文明理念。孫中山敢於和善於與外人結交往來，體現了他的政治自信與人格魅力。而西方視閩中的孫中山，以及對中國社會形象、政教形象、精神形象的評析，亦不失為研究的著力點。

①余齊昭：《中山文史》，第35輯，廣東中山：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，1994年。

②鄒佩叢：《中山文史》，第57輯，廣東中山：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部，2005年。

③參見孔祥吉：《略析馮自由〈革命逸史〉的嚴重缺陷》，北京：《博覽群書》，2012年第8期。

④⑤馮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，下，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878、881頁。

⑥參見王華生：《黃岡起義與社會反響：以漢文〈台灣日日新報〉為中心》，廣州：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碩士學位論文，2012年。

⑦孫中山於1924年從韶關回師廣州之前，曾給鎮守廣州的汪精衛、蔣介石、胡漢民和廖仲愷寫過三封信（胡、廖兩人合為一封），指示如何應對商團事變，

措詞基本一樣。中國革命博物館藏有另有一封致廖函，偽質明顯，難以為信。

⑧孫元起編：《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譜》，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1年。

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：《孫中山全集》，第十一卷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，第145頁。

⑩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：《孫中山全集》，第八卷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，第138頁。

⑪埃德加·斯諾：《復始之旅》，宋久、柯南、克雄譯，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110頁。

（作者係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，博士）